

枕边书



《围城》

钱钟书先生用讽刺的手法完成了这部巨著，无论是从人物的姓名，还是其他各方面，都能体会到钱钟书先生的良苦用心。比方说主人公方鸿渐，取自《周易·渐卦》，因为渐卦中每一个爻的爻辞开头两个字都是鸿渐，寓意着主人公是归国的人才。钱钟书先生在书中赤裸裸地展现了那个年代一些人爱慕虚荣、死要面子等特点，也毫不客气地讽刺这些人。时至今日，社会上仍有像方鸿渐初次相亲时遇到的张小姐那一家人一样的人。所以印证了先前那句话，好的小说，是有现实意义的。《围城》中的人物，放到现在，仍是极具代表性的。

《围城》为什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现象之谜，就是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种反顾、一种打量。那么它描绘了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心理劣根状态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说，每个人都可以在方鸿渐身上或多或少地找到自己的影子。现在的中学和大学的知识群落，这些文化人何尝不像当年那样，人们陷入在一种荒诞的文化困境里面。就是说钱钟书当年描述的文人窘态，这种知识群落的思想顽固，在今天依然延续着，这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王旭)



《江南三部曲》

著名作家格非以《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格非属于擅长对文学、社会、历史等问题做深入思考的学者型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坚韧、优雅、准确、睿智等特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江南三部曲》是格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探索，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演变轨迹。前两部《人间烟火》和《山河入梦》，写的是国民革命早期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广泛透视了个体在剧变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深切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江南三部曲》写的是国民革命早期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广泛透视了个体在剧变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深切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前两部《人间烟火》和《山河入梦》，写的是国民革命早期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广泛透视了个体在剧变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深切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陈曦)



《石泉古城老街》这部摄影集由中国的摄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摄影集以石泉古城老街为题材，共精选了256幅作品，由《老街千年》《老街百姓》《老街美食》《老街时光》等10部分组成。摄影集以平民化视

角，纪实的手法，讲述了石泉古城的老房子、老街道、商业、民风、民俗等千年积淀。作品运用光与影、人与自然、宏观与细节等，为读者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又活灵活现的古城老街，充满了乡愁乡韵色彩。

石泉老街位于石泉县城南部，全长1千米，历史上曾经是商贾云集、繁荣富裕的商贸一条街。随着县城规模扩大和城市中心北移，老街低矮的房屋结构、陈旧的木板门面房和落后的排污设施满足不了现代人追求宽敞舒适、清洁卫生的生活要求，老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石泉县城老街及东、西城门楼经过2007年—2008年的修复，重现明清时的建筑风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作者陈晓琴系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省摄影家协会会员，2008年开始摄影创作，作品《在水一方》入选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展，《老街》组照入围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2019年拍摄的《老街斜阳》在陕西省建国70周年摄影书画作品展中获得一等奖，2020年拍摄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品入展安康市“战‘疫’·记忆”展。

(梁真鹏)

读书

媒介评价样本

薛耀晗

自198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自上而下建立报刊审读制度已有33年。报刊审读作为“加强和改进新闻出版管理的重要方法”，对坚持正确的新闻出版方向和舆论导向，发挥着保驾护航的作用。近日，一本记载陕西省报刊审读30年发展历程和不凡成绩的专著《媒介评价样本——陕西报刊审读报告（1988—2018）》（以下简称《媒介评价样本》）刚一面世，就获得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

在4月11日召开的出版座谈会上，省内资深报刊审读专家和新闻传播院校学者称赞，该著全面总结了陕西报刊审读30年的实践经验，具有思想政治价值、学术史料价值、媒体借鉴价值。4月12日，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舆论研究所所长雷跃捷教授读了网络媒体报道，给执行主编薛耀晗发来微信，他说：“报刊审读是媒介批评一种鲜活、生动的实践形式，做好报刊审读，是保证新闻报刊高质量采编、出版发行的一项重要监督措

施，更是保证新闻宣传、意识形态安全的一项不可替代的方法。30年如一日，你兢兢业业坚守这个岗位，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表现了一个新闻战线的战士应有的职责和担当。鉴于此，请接受我这个新闻教育工作者崇高的敬意。”

陕西报刊审读工作起步于1988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30多年来一直稳健发展，突出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落实专门机构和队伍建设，奠定了报刊审读工作的坚实基础；二是开拓性地解决经费问题，为报刊审读工作正常开展提供经费保障；三是创办了全国唯一的报刊审读公开刊物，推动了陕西乃至全国的报刊审读工作；四是发挥审读专家团队和审读刊物平台优势，报刊审读学术研究在全国独树一帜；五是一系列创新性的审读成果和实绩，对报刊审读的规范化、科学化具有研究和借鉴价值。

《媒介评价样本》分为序言、7章24节、大事记、附录和后记，共41万余字。由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新闻报刊处审读室编，该局分管审读工

作的副巡视员肖松云、新闻报刊处长杨晓建、原陕西省出版物审读中心主任薛耀晗担任主编。2015年至2018年历时4年多时间编纂完成，其间由于疫情等原因，2021年3月付梓。第一章报刊审读组织建设共3节，分别介绍了审读机构变迁、审读员队伍建设、审读实务、审读专项经费审批、获新闻出版总署表彰等情况。第二章报刊审读制度建设共3节，主要介绍陕西省报刊审读暂行办法出台、有关审读制度修订完善，落实《报纸期刊审读暂行办法》的举措。第三章报刊审读工作共7节，分别介绍了报刊审读会议、1999年—2018年的审读工作简报目录、全省两次正式报纸和社科期刊质量评审分级、报纸专题审读10个案例、期刊专题审读8个案例、审读中心与相关方面共同审读案例、科技期刊审读7个案例、助力“陕西大报名刊培育工程”审读5个案例。第四章报刊审读创新共4节，主要介绍上门审读10市党报、专项审读5个案例、报纸传播创新案例评选5个案例、审读成果转化经验体会。

第五章办好报刊审读刊物共3节，从《报刊之友》到《今传媒》的求新求变轨迹和对审读促进作用、探讨研究报刊审读理论、出版审读图书成果。第六节陕西报刊审读的社会反响共3节，主要介绍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业界学界对陕西报刊审读的关注和研究、相关会议交流和媒体对陕西报刊审读的评介。“大事记”记载了1988年至2018年陕西报刊审读的大事要闻。附录文献20余篇，重要的有陕西省报刊质量评估及实施办法、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为薛耀晗专著《报刊审读初探》写的序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范以锦为陕西省开展报纸传播创新案例评选撰写的专文《创新中坚守和转型》，陕西省出版物审读中心被新闻出版署评为“优秀报刊审读单位”，钱之强和朱希良获评“优秀报刊审读员”的事迹介绍，《新闻前哨》期刊研究专栏评介《今传媒》的论文《区域性新闻学术期刊竞争力打造——以〈今传媒〉为例》等。

安康书评

书写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美好诗篇
——简评黄振琼《驻村扶贫记》

柯长安

旬阳作家黄振琼，41万余字的《驻村扶贫记》，走进脱贫攻坚一线，感受火热的脱贫攻坚生活，捕捉多彩的脱贫攻坚场景，书写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美丽诗篇。《驻村扶贫记》生动讲述了一组组的脱贫故事，描绘出一系列血肉饱满、可歌可泣的党员干部、农村群众形象，他们用拼搏、努力和奋斗，创造了决胜脱贫攻坚的阶段性成果，唤起贫困户“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拼搏精神，提升着人们的奋斗愿望。

都说散文就是美文。当然，纪实散文更不能例外，它不仅文要美而且内容还要真实可信。简单地说有语言美、叙述美、结构美，当然更少不了故事的美。语言的美是源自生活之中的语法表达，而不是形容词的组合和堆砌。也就是说生活中的土语方言，它简约、朴实、干净、明快，看起来粗糙土气，实际上它是最美的语言；在叙述中也要讲究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技巧，或者是写作手法，按照文章的主题思想，先来写什么后写什么，甚至那些不写，是有选择性的，不要去记流水账；虽然，文学作品要源于生活，但它又要高于生活，所以说，文章的结构是要跳出生活的包围圈，形成具有文学艺术的结构模式。这三美都要建立在文学思想之美上，也就是说，我们的散文要扬善击恶，具有正能量之风格。黄振琼的《驻村扶贫日

记》具有以上之美。

有人简单认为扶贫工作就是入村串户、填报数据、看起来单调无味、无惊天动地之事，其实，扶贫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只要是有心的人总会从废墟里找到金子，化腐朽为神奇，从平淡生活中感悟出精彩，从暗淡中发现亮点，然后，把它举起照亮后面人前行。黄振琼就是在平淡无奇的扶贫工作中，沉下身去，察言观色，洞彻人性，发现精彩，召唤前行的人们。

黄振琼的《驻村扶贫记》，给我们展现出的是一幅真实的乡村扶贫画卷，用小人物小故事大透视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呈现出脱贫攻坚历程。作家通过自己亲身驻村经历、感受、感知、感悟，真实记录了一个贫困户，乃至一个村扶贫脱贫的印象。当然，文章同时也有黄振琼对扶贫工作的探索性思考。生动鲜活，情真意切，为读者呈现出驻村干部和村民一起奋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的精神风貌。

写小事写平凡人，也就是说以小见大，见证出贫困村落艰辛的脱贫之路，是众志成城的凝聚力量开拓创新之举，是这本纪实散文集最大的亮点之一。我们有好多写文的人都想弄一篇惊人的作品来，于是，就抱怨自己所处的位置底下，摸不着上层的大人物大事件，咋能写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文章。其实，这些想法是不正确的。黄振琼笔下的人物都是些凡人，比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种地放牧的村民等，没有一个是大人物。就写就说他们油盐酱醋，过日子的事，有快乐的，也有烦心事，麻烦事，就是这看起来的小事，其实就是百姓关心的大事，要紧的事。黄振琼就紧紧抓住了这些生活的细节，生活的脉搏不放。写出了生活的真味，写出了文字的精彩，写出了获得全国“我的驻村扶贫故事”征文大赛一等奖作品《我和他们的忘年交》，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平时努力刻苦的必然结果。

《驻村扶贫记》是村民勤劳、朴实奋斗史，是扶贫案例性的文稿，也是激励他人奋进的精神食粮。同时也是黄振琼扶贫工作的一次回顾性总结。黄振琼所入驻的村有9个村民小组，293户，986人，耕地面积3526亩。全村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留守在村的大都是些年迈体衰的，或者是要上学的儿童，这也是现阶段农村存在的普遍现象，面对这些问题。黄振琼从进入该村第一天起，就通过入户走访，了解真实情况，建立一户一档案，一户一帮扶措施，不搞千篇一律那一套，按户把脉下药施策。就这样慢慢走上扶贫路，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见证者、实践者、记录者。

作家感悟

风雨飘摇中的白玉兰

曹乐

1942年的春天，冰层渐融，树芽刚冒出了头。在颠沛流离的大时代里，痛苦与自然的生机无关，春夏秋冬在时空里转过来又转过去，生命复苏觉醒。呼兰河开始解冻了，由坚硬变得柔软，萧红却像河水一样悄悄地流逝了、流逝了，在她人生的第31个春天来临之前。在距离1942年整整79年的今天，我再读萧红的重要作品，感受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无法被忽视的“她”力量。

呼兰河是中国最北部黑龙江省的一条河流，它所在的呼兰县，一年有四个月都飘着白雪。1911年，萧红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她是一朵白玉兰，却长在了青苔覆盖的岩石上，有着难逃的身世。那个年代封建意识根深蒂固，重男轻女，萧红出生之后并不被宠爱，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许配下了“门当户对”的婚事。三毛曾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才成就了那么完美。”可是，萧红对比了贫困又颠沛流离的成年后，也很难把自己的童年修炼成幸福的。父亲对萧红只有暴力和漠视，祖母刻薄疏远，母亲忙于家务，在儿子出生之后更是对萧红失去了耐心，而后在萧红九岁时离世。唯一给萧红爱和温暖的只有祖父。萧红中学毕业之后，为了逃离包办婚姻来到了北平，从此开始了辛苦坎坷、动荡漂泊的一生，直到1942年在香港逝世。出生在中国最北部的这朵白玉兰，曾以岩石为根，开出了玉石般极美的花，惊艳了一山的春天。她美丽得如此不可思议，不属于那个动荡的年代，最终凋零于中国最南部的泥土中，她的生与灭是时空偶遇的因缘，然而她扎根

岩石所迸发出的那种清明悠远的力量，苦难都不曾掩埋过。

“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打成荫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动荡避天的大伞。”《生死场》里的各色人物就从这样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场景边登场了。小说原名《麦场》，是萧红创作于1934年的作品，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以哈尔滨近郊偏僻村庄为聚焦点的东北乡村的生死死生。当时的中国内战不已、颠沛流离。人不是人，是牛是马，社会不是社会，是病态的是扭曲的熔炉。《生死场》是不到25岁的萧红，对女性以及那个时代的生死存亡进行了追问和思索之后创作出来的作品，鲁迅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第一次读这本小说的我还处在高中时期，只能对细节建立起压抑又心碎感觉，如王婆将老马送到屠宰场，哭湿袖子。把自己的孩子摔死，却没有眼泪。月英

瘫痪在床，身下生虫，丈夫不管不问。如今再读这部作品，我有了更多的感悟。全书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是萧红对“女性身体”所引发的个人生死存亡问题的种种思索，后一部分笔锋一转，从时代前途的视角来进行宏观描述：当人们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连做动物的权利都没有，在生和死里面就不得不选择生。整部小说是面透镜，着重刻画的仍然是女性部分，正如萧红所说的，“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生死场》仅有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敏感，还兼具男性作家的粗犷冷峻。在当时的文坛上如一声春雷，划响了整片天空。

《呼兰河传》是萧红1940年在香港完成的作品，也是她逝世前最后一部完整的作品。它的发表代表了萧红写作艺术的炉火纯青。此时的萧红，文笔功力已经成熟，沿着萧红的文字就可以穿越进有呼兰河的世界：唯一给她爱与温暖的慈祥祖父，被折磨致死的12岁的团圆媳妇，毫无思

读书时光

乡村借书记

苑广阔

喜欢读书之人，最怕无书可读。现在的读书人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借书有图书馆，买书有书店，手机网络上的电商平台，上面的图书更是应有尽有，浩如烟海。

有时候看着我书房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从内心感到满足和幸福，也很容易想起少年时代那段借书而读的日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很多人家除了赶集买东西，偶尔会带回来一张包东西的报纸，几乎找不出一张带字的纸片。

上了小学高年级，课本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阅读需求，如何找到更多的书读，成为当务之急。那时的我，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小兽，在村里到处搜寻可以果腹的精神食粮。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在村里找到了一个“图书宝藏”：离我家不远的五爷爷家。

五爷爷和我同姓不同门，以前当过小学老师，他自己喜欢读书，也喜欢晚辈们读书，所以家里收藏了很多图书，有武侠小说，也有中外名著。这些图书据说是“文革”时“破四旧”，五爷爷冒着很大的风险，从公社仓库那些将要被焚烧的图书中抢救出来的。

五爷爷的这些书一直都在，只不过我以前年

龄太小，也没有到处找书读，一直都不知道，经常去五爷爷家里借书看的，是村里的一些初中生、高中生。

五爷爷愿意把书借给村里的晚辈看，却也面临一个很大的苦恼，借出去的书，往往很难及时收回。五爷爷这里毕竟不是图书馆，如果逾期不还书，会有逾期费，最多就是来借书的时候叮嘱几句：看完了快还。

结果就是很多借出去的图书，又被借给了其他人，最后借来借去，就找不到了，害得五爷爷几乎每天都要去借书的人家里讨要自己的图书，多数时候还讨要不回来。

更让五爷爷担心的是，借出去的书多，收回

的书少，后面再有人去借书，就没书可借了。为此五爷爷想了一个奇招，把一本厚厚的武侠小说，拆成“上下两集”，甚至是“一二三四部”，每本都用牛皮纸做好封面封底，装订好，封面上写上小说的名字，第几部等等，五爷爷还特别写上一句“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这样原来只能借给一个人的书，就可以同时借给好几个人看了。五爷爷本来是好意，是为了让更多人有书可读，却最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一旦其中一本找不到了，整本书就成了“残书”“废书”。

不过这样的灾难性后果，却成全了我。第一次找五爷爷借书，他觉得我太小，有些信不过我，

就借给了我一本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没想到一周以后，我看完了如期归还，后来也是如此，五爷爷看我年龄虽小，但做事靠谱，从此放心把书借给我，还委任我一个重要任务，帮他把有借无回的图书讨要回来。

从此以后，村里人就经常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半大小子，每天东家进，西家出，满头大汗地找书要书。有时候书被张三借给了李四，又被李四借给了王五，所以我往往要跑三四家，才能找回一本书。

不过我有的是时间，最关键的是能够软磨硬泡，书不到手人不走，所以几乎没有我找不回来的书，为此深受五爷爷赏识，他那里的所有图书，也对我无限制开放，很多世界名著、古典小说，我都是那个时候读完的。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五爷爷早已离开人世，我的女儿正好和当时的我一般大。我总觉得她现在之所以能够从事文字工作，和那时候的阅读积累、培养的对文字的爱好，以及文学对我的滋养，有着莫大的关系。

现在读书的条件那么好，让人倍加珍惜，当年一边奔波着讨书，一般拼命读书的日子，也让人无比怀念。